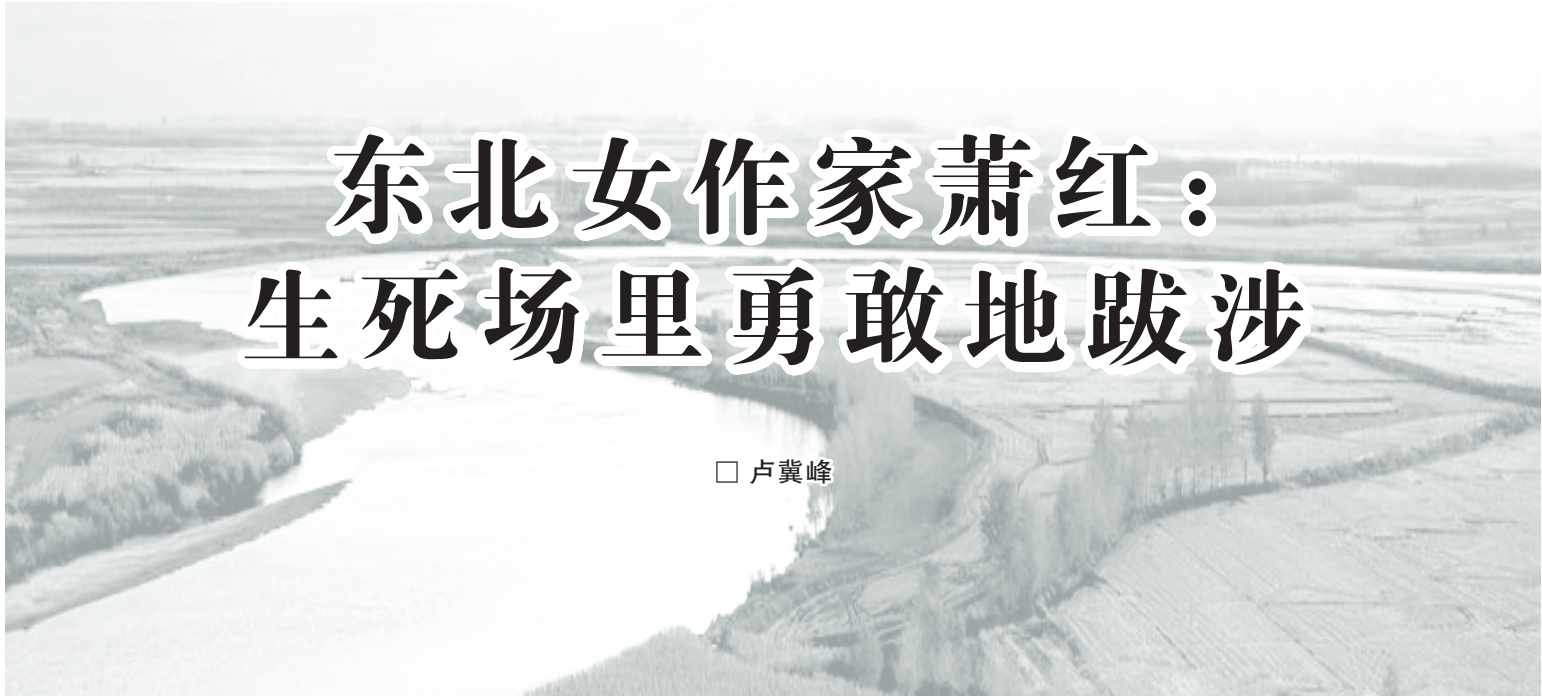




东北女作家萧红：生死场里勇敢地跋涉

□ 卢冀峰



白山黑水深处，呼兰河奔流不息。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誉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从故乡的呼兰河畔携一泓着波奔向时代的洪流。在31年的匆促人生、不足10年的创作生涯里，萧红以一支灵秀之笔写就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独具一格的文学篇章，她把对故乡和祖国的热爱、对苦难同胞的悲悯、对自由美好的追求深深倾注其中，发出了反抗阶级压迫、呼唤抗日救亡的文学先声。

抗争意识的萌发

萧红（1911—1942年）原名张迺莹，出生在哈尔滨呼兰县（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萧红自幼丧母，母亲去世时她刚9岁，父亲张廷举供职于当地教育界，身份看似开明，思想做派却封建守旧。在冰冷压抑的家庭环境下，温厚的祖父张维桢给了萧红缺失的疼爱和包容。“傻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傻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回忆了祖父陪伴下的这段“野蛮生长”的儿时时光，它涵养了萧红解放的天性，赋予了她笔端闪光的灵性。

萧红对脚下的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对苦难的同胞有着发自心底的悲悯。那时的东北乡野被一片封建荒蛮笼罩，日寇的铁蹄正步步逼近，阶级压迫、外敌入侵唤醒着萧红的抗争意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反帝爱国热潮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正在读小学的萧红，参加了呼兰县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并参演了话剧《傲霜枝》，展现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文艺天分也初步显露。1927年，经过数次与父亲抗争，萧红得以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今萧红中学）继续读书。在这里，萧红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作品为她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次年，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新五路”的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在哈尔滨的游行队伍里，17岁的萧红不畏反动军

警镇压的枪声，自告奋勇、冲锋在前，大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她在散文《一条铁路的完成》里写道：“‘不怕！’虽然我和别人一样的嚷着不怕，但我对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到来的感觉，好像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此时的萧红，心底爱国的嫩芽是幼小的，却饱含热情和希望，正像她在冲破学校对游行的阻挠时所说的：“密封的罐头打破了！”

心向光明的跋涉

1933年10月，萧红和萧军的作品集《跋涉》问世，这部集中反映伪满洲国统治下东北人民悲惨处境和不屈抗争的作品集，轰动了东北沦陷区文坛，二人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亮的明星”。“跋涉”一词，正是萧红早年在故乡东北以笔为枪的斗争生活写照，寄寓了她向光明追求的信念和心路历程。

1932年9月，与旧家庭决裂的萧红历尽痛苦流离，在哈尔滨市欧罗巴旅馆短暂停留，又辗转栖身在哈尔滨商市街（今红霞街）25号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度过了近两年饥寒交迫的岁月。旅馆的“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出租屋里仅剩“最末的一块木样”，饥饿的感觉、寒冷的体验，是萧红笔下至今让人读来都心疼不已的文字。在艰苦的条件下，萧红创作发表了处女作《弃儿》，这篇取材于萧红自身悲惨遭遇的作品，描写了临盆在即却流离失所的女主人公“芹”的绝望与挣扎，写出了“芹”在抛却痛苦与纠葛后女性意识、反抗意识的觉醒，成为萧红文学生涯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东北舆论主阵地的东北报界遭到日寇清查，原有的80余家报纸仅存10余家，《大同报》等殖民宣传毒瘤充塞着东北。在十分恶劣的形势下，萧红积极投身共产党人金剑啸、罗烽领导的反满抗日文化运动，开展了策略性的斗争。当时，报纸副刊常是日寇的审查盲区，《大同报》的副刊《大同俱乐部》《夜哨》和《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国际公园》等成为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抵抗的副

刊”，萧红均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活跃的创作主将。

“你愿意像一条死狗般地顺水流去吗？起来起来，这是‘夜哨’的忠告……”，《夜哨》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1933年8月，萧红参与创办并亲自命名的《夜哨》问世，“夜哨”寓意为“夜里值的”，以空前的战斗性著称。《夜哨》感召和鼓舞了许多东北青年作家团结一道为苦难写作、为抗战发声，有力地配合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夜哨》共发行了21期，萧红创作的《夜风》等8篇号召抵抗的作品连刊13期，这无疑将自己频繁暴露于危险中。1933年底，《夜哨》被禁，主编陈华被捕，萧红也遭到日伪特务的严密监视，1934年6月，萧红被迫离开故乡东北，踏上了漂泊之路。

“抵抗的副刊”影响和锻造出的这支文学劲旅，后以“东北作家群”的身份蜚声中国文坛，萧红是当中最耀眼的一位，她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形成于这一时期。萧红很少直言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她俯身拥抱东北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女性敏锐的感受力、超强的共情力给予细致入微的刻画，又在冷不防里给人以深深震撼。

生死场里的淬炼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1935年12月，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奠定了萧红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萧红以充满野性和张力的文字，真实展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生死场”，给上海文坛带来了原始的火、旷野的风。鲁迅作序赞赏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住已经力透纸背。”

《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极其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面对日寇入侵的觉醒和反抗。萧红笔下的“生死场”，既是东北乡野，更是整个中国大地，既是肃杀之地，更是觉醒之所，引起了国人强烈共鸣，吹响了觉醒和奋起的号角。

在“生死场”，萧红历经了动荡人生的淬炼。从1934年离开东北，萧红一生辗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

庆、香港多地。这数次的“离开”，既源于生活和情感际遇的起伏，更源于时代和理想的召唤。在上海，萧红感受了鲁迅“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和鼓励：“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作品大两样”。1938年，萧红奔赴临汾、西安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文艺运动。在西安，萧红参与创作的抗战戏剧《突击》引起了巨大轰动。正是这些“离开”，使萧红从更多的视角目睹了国家的苦难，获得了创作素材，迸发了创作灵感。

“生死场”淬炼出了一个创作上不拘一格的萧红。“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不同于以往的彪悍与冷厉，1940年在《呼兰河传》里，萧红站在故乡的河畔向读者“呢呢喃喃”，她用女性的细腻和柔软，给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这些苦难的生灵以心的召唤。在未能完成的小说《马伯乐》里，萧红绘就了一幅战乱世俗图，她以绝妙的讽刺手法，揭露了国难当头之时，国统区里马伯乐等“魑魅魍魉”的丑陋嘴脸。“生死场”淬炼了萧红，萧红报之以作品的多彩，而这些不拘一格，始终都不曾脱离她创作的根与魂——生死场。

1941年9月，身患重病的萧红在香港写下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和《“九一八”致弟弟书》，在生命终点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用直白的文字深情吐露了不变的心声：“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萧红，一生短暂而炽烈，她是大地孩子、爱国的赤子、异乡的浪子。她在时代的生死场里勇敢跋涉的足迹，值得我们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合两朝宰辅折圻，第一流人终不忝”——这是清代名臣林则徐赞许蒋攸锬的诗句。蒋攸锬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位能吏，官至正一品体仁阁大学士，曾先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本人精明能干、清廉勤政，还长于发现、重用人才，激励部属作为，道光皇帝说他善于“察吏安民”。

蒋攸锬（1766—1830年），字颖芳，号砺堂，祖上由浙江迁徙辽东，自幼聪颖好学，19岁即考中进士，《清史稿》中说他学习能力和记忆力极好，“敏强识记，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

蒋攸锬中进士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尽职尽责，直言进谏，深为嘉庆皇帝所看重。嘉庆五年（1800年），蒋攸锬外放江西吉南赣宁道台，在其赴任之初，嘉庆皇帝嘱咐江西巡抚：“察吏所以安民，蒋攸锬江右之良才也，汝其任用！”

嘉庆十六年（1811年），蒋攸锬升任两江总督，针对当时两广地区匪盗

善于察吏安民的清代名臣蒋攸锬

□ 李晓巧

横行的情形，他选拔优秀文武官员驻守广州、肇庆、韶关、连州等地，打击匪盗得力有效。嘉庆十八年（1813年），蒋攸锬上奏嘉庆皇帝，认为当时一些地方骚乱“由于吏治不修所致”，而“防乱于未然，首在甄别道、府、州、县”，意思是地方治理好坏，关键在于选用好各级官员。蒋攸锬指出当时地方官场种种乱象，“近日州县贪酷者尚少，而委靡者甚多”，而更糟的是，各地道台、知府常常推崇平庸无能的州官、县官，而把勤于任事的州官、县官视为“多事”，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而总督、巡抚们常被他们所蒙蔽。蒋攸锬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多年的用人积弊，破格选拔任用官员，不仅要严惩贪

酷虐的州县官，对那些平庸无能的官员也要随时停职或者改用。嘉庆皇帝觉得很有道理，谕曰：“知人安民，洵至言也。”嘉庆一朝，采纳了不少蒋攸锬关于治吏、选官的方法和建议。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调蒋攸锬任四川总督。明末清初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以此形容四川地区历来难治。清朝对四川总督一职相当重视，一直选派能力比较强的官员担任。任上，蒋攸锬注重治安、兴修水利，兴办书院、培育人才，同时积极安抚地方土司，发展地方农事，政绩好于其他地区，且“抚绥有方”，受到清廷嘉奖。

清宗室皇族昭槿在《啸亭杂录》一书中，将蒋攸锬列为嘉庆初年第一

流谏臣。书中记载蒋攸锬任内阁学士时，勤勉有为，经过查访调查弹劾了很多地方大员，并且一一核实论罪。昭槿言：“外省（地方省份）吏治为之更张，实自（蒋）攸锬发也！”可见蒋攸锬在当时的声望。

嘉庆皇帝驾崩后，道光皇帝一继位就将蒋攸锬召回京城。道光皇帝早闻蒋攸锬的才能和操守，称其“为守兼优”，给他加太子少保衔。道光二年（1822年），蒋攸锬转任刑部尚书，不久升任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道光五年（1825年），再升蒋攸锬为正一品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因运河河道堵塞、漕粮难以运达京城，道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兰州的存在。奶奶多次讲起，爷爷年轻时曾在兰州矿上挖过煤，后来因腰伤不能坚持，回了老家务农。奶奶没去过兰州，只告诉我那儿好远离家几千里地。在那个交通、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兰州的“远”，深深烙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

读大学、参加工作以后，了解到兰州的历史文脉与风物人情，心里痒痒的，一直惦记着想去看看，但因工作忙都没能成行。直到去年年底，受公务派遣，方才到了兰州。两个多月时间，尽管工作繁忙，难有闲暇抽出空儿细细感受，但兰州还是“润物细无声”地征服了我这个异乡人，让我体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兰州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城市，古称金城，隋初始称兰州，黄河横穿境内，扼东西要塞，享有“丝路重镇”“黄河明珠”“西部夏官”等美誉。明朝官员王祚曾这样感慨兰州：“洮云陇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谁信西行从此始，一重天外一重天。”字里行间尽显兰州地理之远，人们行路之艰。兰州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受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和太行山、贺兰山、六盘山等山脉的阻隔，来自印度洋的南亚季风和来自太平洋的东亚季风很难到达兰州。连绵山川、高原地貌，直接造成这里气候较为干燥，植被覆盖率偏低。相对东部地区来说，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要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可以想见会更多一些。但这些自然环境与兰州的历史厚重、文化特色一同构成了兰州的独特魅力。

因降水量偏少，兰州的冬天比较干燥。我在兰州的日子里，城区仅下了两场小雪，最大的一场也仅仅是把地表遮盖住，这在当地已是一场“比较大的雪”了。雪纷飞落下，滋润着干渴的大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对雪的渴望和雪带来的惊喜写在人们脸上。住地宾馆里，夜里11点左右洗晾在房间里的厚棉毛衫，一早就干了。为了增加空气的湿度，兰州市民的家里以及公共办公场所的楼道会放置一些开口尺寸比较大的陶瓷缸，缸里装满清水，养几条手指大小的鱼，既起到加湿的作用，也为生活增添几分乐趣。当地人早已习惯干燥的气候，然而对来自江南水乡的我来说，干燥则是必须要过的一个关口。开始两周里，晚上时常会被口渴“叫醒”，早上醒来鼻子里能干出血痂来。后期也慢慢就“入乡随俗”，逐渐适应了干燥气候。

兰州是太容易留住一个人胃的地方，一碗牛肉拉面足以让你记住这座城市。牛肉拉面是兰州人早餐的首选，当地朋友介绍起这碗面时，淳朴热情裹挟着自豪扑面而来，那一刻好客兰州随着蒸腾着的牛肉面香气四溢，瞬间会把你感动。兰州人好牛肉拉面这口，一年四季不分寒暑，生生把它吃成了“中华第一面”。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牛肉面店，各有各的拥趸。每家食味虽不尽相同，但标准是统一的。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拉面，“汤镜者清、肉烂者香、面细者精”为佳，形神要“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所谓“一清”，即汤清；“二白”，即萝卜白；“三红”，即辣椒油红；“四绿”，即香菜、蒜苗绿；“五黄”，即面条黄亮。根据面条粗细、形状和韧劲的不同，面条分为“大宽、二宽、薄宽、韭叶、二细、三细、细的、毛细”等好多种。记得初次点餐时，面对这么多选择，真有些无所适从，好在



□ 卢大海

情牵兰州

在兰州不是待一天两天，得以有机会把各种尝个遍。

汤是牛肉拉面的灵魂，虽为肉汤但很通透，有说是用新鲜牛骨熬制许久而成，有说以牛肉、肥土鸡为主料，采用30多种调料和中药调配熬制而成，说法种种。面条爽滑透黄、筋道有力，吃在嘴里的感觉是清增润、白解热、红提香、绿祛腻，“清白红绿黄”的协奏，成就了清新脱俗的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标准特色鲜明，口感老少咸宜，到现在每每想起来，还是满口生津，忘不了面的筋道、汤的清新、肉的香烂。

在兰州期间，当地的伙伴，工作上给予我最大的支持，我们一起加班加点，晨光熹微一起、日衔西山一起、满天星斗一起，结下深厚友谊，从此兰州多了几个特别好的兄弟。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街市排档深入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息，他们特地把羊头肉、拌羊杂、羊肉烤串买回住地，夜已深，不曾饮酒，边吃边聊，谈天说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我们约定，下次再来，一定到“如意”甘肃各处走一走，看一看河西走廊、敦煌壁画，品一品民勤羊肉、东乡手抓，尝一尝天水樱桃、静宁苹果……

他们告诉我，兰州的七八月份最宜人，草木葱茏、空气湿润、天清气爽。冬日兰州，向往兰州夏季的种子，在我内心种下。疫情过后，一定会经常去看看，不仅为这里的山川风景、历史人文，更为这里我牵挂着的淳朴善良的人们。



（1830年）十月，蒋攸锬病死在进京赴职途中，清廷赐谥号“文勤”。

作为封建官吏，蒋攸锬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但他精于察吏和善于发现人才、敢于使用人才的很多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清史稿》中评价蒋攸锬：“尤长于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著。”除了林则徐，道光时期邓廷桢等名臣也曾得到蒋攸锬的识拔和支持。蒋攸锬去世后，林则徐特地写了一副挽联“培四海贤才俊义，在三师事有同悲”，以表达对这位名臣的尊敬和崇拜之情。

